

雙重變奏曲：探究「九二一」地震 「失親家毀」受創者之心理經驗現象

林耀盛 吳英璋

本研究透過田野參與觀察、深度訪談法與解釋性互動論，探討「九二一」地震遭逢「家園毀損」及有「親人罹難」雙重災變受創者的心理經驗現象。研究田野為台灣中部某受創嚴重的鄉鎮，研究時程為民國90年八月份至民國91年十二月份，為「九二一」事件屆滿兩週年至三週年之間，前後共有10戶「失親家毀」的女性受創者接受至少一次的訪談。研究發現受創者在「內在心理作用」方面，顯現的經驗現象包括「芻思」（多想少說）、「拒認」（只想不說）、「依附」（既說且想）和「昇華」（再說再想）。無論是「多想少說」或「只想不說」，當案主較少敘說受創經驗時，整體的心身適應相對欠佳。無論是「既說且想」或「再說再想」，重要的是案主得以敘說自身遭遇時，整體的心身適應相對較佳。在受創者的「社會歷程作用」方面，呈現三種經驗現象，「弱紐帶的形成」、「家園重造的彈性力」以及「『思』與『說』距離的位移」。至於受創者面對災變的「角色抉擇因應」為「豎立生活新里程碑」、「從受害者轉為助人者」和「生活信念的逆變」。進一步看，案主得已在「想」和「說」之間產生零度距離，重要的關鍵經驗轉折為「周遭他者的支持傾聽」，以及「家園原地重建」。再進一步分析，得以家園原地重建，且又有弱紐帶的形成，案主的心身適應狀況最佳。家園尚未重建，但有弱紐帶的形成，案主的心身適應不至於惡化。但家園易地重建者，案主的心身適應狀態顯得最為不佳。最後，本文提出研究概念模式，並進行相關討論。

關鍵詞：創傷、內在心理、社會歷程、角色抉擇

作者：林耀盛：台灣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東華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電子郵件信箱：yslin@mail.ndhu.edu.tw

吳英璋：台灣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收稿：2003年01月02日；接受：2004年02月16日



一、研究背景

SARS風暴在沈寂一段時日後，可能捲土重來的警訊不斷釋放出來，入冬後的台灣，果然爆發了後熟時期全球第一例SARS病例。轉眼，「九二一」地震迄今也已經屆滿四週年。我們，似乎始終在災難的陰影籠罩裡。從新紀元位置回眸災難的二十世紀，假若台灣社會「九二一」地震的犧牲可以昇華建構一個具高度反省力的書寫空間，則我們可以指出「九二一」地震預示著台灣「風險社會」的降臨。從「九二一」震災到「九一一」事件到「九一七」水災到SARS疫情，無論是天然災害或人為攻擊或病毒侵擾，顯微具象著風險無國界，若說風險也已經成為全球化現象之一環並不為過。Giddens(1991)認為，面對風險社會不確定感與日遽增，個人生活風格的形塑與生涯規畫的決策，雖然呈顯複雜性與多樣性的替代選擇機會，卻反而面臨高度風險的威脅。在此既自由選擇又面臨風險的狀況下，具反思性的自我(reflective self)往往發展出對他者與抽象系統(如貨幣系統、專家政治)的新信任關係，藉由這種抽象信任關係的建立，自我得以獲得一種本體上的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同時可以克服已逐漸成為常態性的焦慮風土病。套用Giddens的論述，置身晚期現代社會，具反思性自我的個體，面對創傷事件或風險效應的敘說往往涵攝一種「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自我抉擇，個體可以從敘說創傷經驗中不斷反思，進而賦予生活成長與心理發展的積極意義。

「九二一」地震發生已然度過第四個年頭，我們又從中獲得什麼啓思？Giddens(1990/2000)認為我們對於一些重要危害的風險，可能會產生一種麻木的感覺，甚至是一種厭煩。他認為，現在，人們已經對存在著許多風險這個事實有了普遍的瞭解，這種麻木的概念也已經成為某種老生常談，「老是傾聽我們所面臨的危險，這本身就有一種麻木的作用。由於它是如此地令人耳熟能詳，於是成了一種我們姑妄聽之的呼喊和祈禱」(Giddens, 1990/2000)。我們不斷地和這些問題發生撞擊，以致於它們本身也成了難以駕馭的背景的一部份。對危機麻木，其實也在緊縮著我們的生活世界。van den Berg(1996/2001)曾經這樣描述：「只有讓世界靜靜地引退，讓事物慢慢沉澱，我們才能睡著。此時世界移出我們的視線之外，變得沉靜，我們才



漸入夢鄉。只有在讓事情逐漸從我們身上消退，我們才能夠睡著。失眠的人最能瞭解：生活裡的一切並不沉默，事情不斷在咆哮，大聲地苦苦哀求，要他保持清醒，白天的事件不斷旋轉，失眠者就在床上忐忑不安。睡眠不只是一個生物體在生命延伸時所需的生理復原動作，還意味著世界不再說話，睡覺是一種房間的樣態，一種屋子的狀態，是陳舊的碗櫥發出嘎嘎的聲音，煙囪裡呼呼吹進來的風，樹梢搖曳的沙沙聲，或是遠方傳來的狗叫聲。」受創者往往就像是失眠的人，當對置身處境感到麻木，以為時間可以沖淡傷害，但受苦經驗並未遠離我們，只是我們以一種視若無睹的態度處理；事實上，未能正面處理震災經驗，受創者生活世界的疾苦病痛，仍會不時的潛進日常生活裡，攪動我們存有上的安穩性。尤其，在震災中不幸有親人罹難，同時又家園遭致毀損者，面對如此雙重災難經驗的衝擊，欲清理出頭緒卻治絲愈棼，故其梳理方式容易流於麻木的心理作用，值得持續關注。

鑑於此，當我們回頭反思所謂的災區重建工程，有形的建築設施竣工可以成為丈量重建成果的具體地景指標，但較為人所忽略的是無形的心理療癒經驗狀態。尤其，「九二一」震災中，不幸同時承受「家園毀損」和有「親人罹難」加乘打擊的受創者，她們一方面需面對重建家園的繁瑣事務，一方面又得忍受緬懷親人的苦痛折磨，這是一種「雙重失落」的現象。因此，當這類受創者的實質空間家園重建陸續完工之際，象徵意涵的心理空間是否修補重建完成，是需要持續追索的議題。本研究將以探討承受「家園毀損」和有「親人罹難」雙重失落女性受創者的心理經驗現象，作為論文主旨。

二、文獻探討

Ursano, McCaughet與Fullerton(1994)精準地指出，個體歷經災難與創傷事件時，其心理結構就像陷入混沌(chaos)的狀態，從結構混沌到秩序建立的動力平衡歷程，不是一蹴可幾，而是涵蘊著「長期」效應與「短期」效果。由此，所謂的災後心理重建療癒工作，理當持具如此觀點。以下，本文將先從受創者對死去親人追憶的心理反應經驗及家屋崩解重建涵意開始討論，而後指出本文的問題意識，再進行相關

資料蒐集及分析方式之說明。

(一) 創傷：無法忘記的苦痛和重新記得的困難

創傷(Trauma)一詞的字源學，相當於希臘字的傷口(Wound)。傷口的意義一方面指向一種違常狀態，一方面也預示著治療復原的可能性。Caruth(1995)認為，企圖去獲取創傷的歷史，也是超越個人受苦病理學的一種傾聽的擊劃。抵達處於危機狀態的創傷歷史的途徑，只有承認無法以整全調適的方式始能逼近。面對創傷，言說是不可能的，不去言說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拒絕的行動(act of refusal)並非意味著否認過往的殘酷事實，而是一種逐漸認識瞭解到創傷尚未達致「敘說記憶」(narrative memory)狀態的展現方式，因此，無法以飽滿的語言銓解。拒絕瞭解是一種根本的創造性行動，對於生還者而言，創傷事件的真理，在於事件的發生拒絕簡約的理解。創傷是一種「記憶的滑落」(elision of memory)與「回想的精確」(precision of recall)的奇異組合，創傷的復現影像彷彿保持著創傷的精確，然而創傷大體上卻又是無法以意識性的回憶與控制而抵達理解的位址。是故，創傷是人類存有的一道弔詭謎面。創傷特性的難解謎面，在於創傷本身總是無法完整的認識與洞察，或總是延宕的認識與洞察。Hartman(1995)也指出，關於創傷源起的知識，往往涵蘊兩種矛盾的元素。一方面，創傷的事件往往是一種登錄(registered)，而不是一種體驗(experienced)。創傷總是在知覺和意識之外，直接躍入心靈。另一方面，創傷又形成一種記憶，透過心靈解離的永恆比喻形態，一再地顯像事件經過。所以，創傷是介於無知(nescience)和理知(knowledge)之間，有時置身於邏輯的理解空間，有時又隱遁於詩意的幻象空間。是故，創傷，總是面臨著窮究發現的極限(limit to recovery)，也遭遇著意欲努力洞視(visualization)卻難以圓全的限制。

同樣地，McFarlane與Van Der Kolk(1996 a)則認為，受創者有時面臨著記憶兩難的困題。如果受創者心愛的人不幸罹難或被殺害了，受創者一方面會希望避免想到和這個駭人事件有關的記憶，但一方面又希望可以對逝去的親人保有一種鮮活(永駐人心)的記憶。對存活的受創者而言，「記」與「不記」間，心身千萬難。Kleber, Figley與Gersons(1995)指出，創傷意味著個體與生活脈絡產生斷裂，個體喪失了控



制感與確定感，感受到自己與周遭他者的聯繫被切斷。創傷也可以說是個人對生活世界基本信念與規則的瓦解碎裂，個人的生活在創傷事件發生「前」「後」產生明顯改變。根據Janoff-Bulman(1992)的研究，個體具有三種基本信念：(1)世界是慈悲為懷的。(2)世界是充滿意義的。(3)自我是有價值的。然而，災難的現身，經常拆解搗毀了這些信念，尤其對於有親人罹難的受創者而言，其生活信念更是面臨著瓦解與重組的困境。

McFarlane與Van Der Kolk(1996 a)也指出，導致災難受害者真正受苦的因由往往不是創傷自身，而是來自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社會系統曾經給人們可以提供安全感與可預測性的(虛擬)想像，創傷事件的發生，提醒了人們原來這個所謂安全的社會結構竟是這般脆弱。另一層面是受害者發現她們/他們面臨著將跟創傷有關的強烈情緒與知覺，翻譯成可以溝通的語言的表達能力困難，由於受害者無法用清楚統合的話語向他人、甚至對自己敘說創傷故事和言說感受需求，再加上旁觀者往往也希望自己的生活不要被受創者的情緒所干擾；如此雙重構面的因素，導致受害者貫串修通創傷經驗的歷程，往往顯得崎嶇坎坷。

對於「九二一」受創者而言，若有親友不幸罹難，受苦世界的難以一言道盡，往往加劇創痛的激刺。Baker(2001)認為「服喪」/「悲悼」(mourning)歷程不是一種「祛除依附」(detachment)的歷程，而是一種「轉化」(transformation)歷程。他指出悲悼者與失落客體間關係轉化的模態包括三點：(1)保持一種關愛與照顧的質性。例如當悲悼者遭逢壓力時，會產造一種音容宛在感，想像亡者對其提供情緒滋養與再保證。(2)保持一種問題解決的面向。悲悼者會在心裡「說出」自己遭遇的問題，想像與亡者的對話，以強化自我的功能度過難關。(3)保持一種認同維持的屬性。未亡者會透過一些儀式，在日常生活層面保持一種如昔的狀態，藉由周遭並未改變的形態，維持自我認同感。由此，悲悼者與逝世者之間的客體關係，反倒因為失落的事實，產生新的關係締結，即悲悼者與逝世者間的象徵角色的轉化，因著音容宛在感的力量，推向個體受創後再成長的來源。

Willms(1997)指出，所有個人屬性(personhood)的面向，包括過往生活、家人的過去、文化與社會、角色、工具性的向度、組織聯繫與關係、身體、潛意識心

智、政治存有、秘密生活、知覺的未來，以及超越性的存有向度，都有可能在災變後受到傷害或產造斷裂。Brody認為，我們是生活在敘說的連續性裡，意即我們的敘說通常並不允許（也不預期）不連續的篇章。假若敘說發生了不連續，意味著個體前瞻式的生活故事產生無法預期的崩解，個體就容易陷入受苦狀態裡。當個體的記憶伴隨著深邃的敘說不連續性，可能就會抑制個體全然地歸返主流世界裡（Willms, 1997）。「九二一」地震發生兩年至三年間，失親受創者是以什麼方式敘說（記憶）罹難者，她們的生活世界又呈現何種景況，未來可以透過何種處理策略式介入療癒，這是從事災後心理衛生工作，不可忽視的議題。

（二）家園：實質的空間構造和象徵的存有意涵

自我與周遭環境的變形扭曲，容易使個體陷入心理原型的深層陰影裡。法國思想家Bachelard（1969/2003）在《空間詩學》的隱喻裡指出建築像是身體的挺立，閣（頂）樓是一個私密空間，像頭部是訊息儲存的樞紐，是個人成長記憶的集結地，地下室是幽微闇黑的空間，卻是支撐身體的基點。由此延伸，大地震震垮了樓房，變形倒蹋的房舍像是身體意象的崩坍離肢，地震摧毀的不只是建築本身，也是個人生活傳記史的塗銷瓦解。Bachelard（1969/2003）意在所指的是，家屋是人類思維、記憶與夢想的最偉大整合力量之一。在人類的生命中，家屋盡力把偶然事故推到一旁，無時無刻不在維護延續性，如果沒有家屋，人就如同失根浮萍。家屋為人類抵禦天上的風暴和人生的風暴。它既是身體，又是靈魂，是人類最初的世界（Bachelard, 1969/2003）。

Despres（1991）則整理人們對於家的意義之看法如下。（1）家提供安全感與控制；（2）家是個人理想與價值的反映；（3）家是形塑個人的居住環境；（4）家提供永恆與連續性；（5）家是親友交流的場所；（6）家是活動的中心；（7）家是外在世界的避風港；（8）家是社會地位的象徵；（9）家是一個實質空間；（10）家是一種擁有權。Daly（1992）則認為家作為一種社會團體，具有以下獨特屬性。（1）私密性；（2）集體的意識，這是非家庭成員所能企及的；（3）關係是永恆的；（4）共享的傳統；（5）強烈的涉入（從極端的暴力到極致的親密）；（6）個人興趣、經驗與素質的拼貼。由



此可知，家的意象不僅只是實質空間意涵，同時也是一種象徵時間，在這樣的時空傳統裡，映射著個人認同與居家意義的交互辯證關係。

Pollack (2003) 指出，「所在」(place) 通常被視為理所當然，是行動發生和時間過往的場域。「所在」涵蘊著兩個互為交疊的意義，一個描述地理區位的物理空間，一個指向人們在這個物理空間的互動境況。Pollack (2003) 認為人們會對日常生活所寓居的所在和會執行特定儀式行為的所在產造依附感。「家屋」(home) 通常是產造最大依附關係的場所，家屋是一個安全的地方，界定了個體的存活邊界，人們藉由與家屋的依附關係產生熟悉感和認同感。然而，創傷事件的發生，卻搗毀了個體和家屋間的依附、歸屬和認同。

Mccubbin & Mccubbin (1993) 則以家人因應 (families coping) 為思考，提出家庭成員可以形成一種鍵結的「良好適應」(bond-adaptation) 與互動功能欠佳的「不良適應」(mal-adaptation) 概念。換言之，「良好適應」指稱即使當家庭功能面臨疾病與重大改變時，家庭仍能以建制化的組型，維持秩序感與穩定感，同時也能促進家人正常發展，使整個家庭(人)達到凝聚感與一致感。「不良適應」則指稱家庭單位的功能處於混亂的狀態，因而犧牲家人的發展，使得整個家庭(人)的福祉感、信任度、秩序感與凝聚力呈現下降現象。「九二一」地震發生迄今，家園重建陸續完成，除了有形建築的居住作用外，受創者如何覺知少了親人的居住意義，親人永恆缺席的新家園是否可以發揮昔日的家庭功能，是必須追索的題旨。像 Frantz, Farrell & Trolley (2001) 的研究就指出，當家族裡有人罹難，失去心愛的人是一種失落，卻也涵蘊著正向的結果。他們發現(1)許多悲悼者認為歷經死亡事件後，他們學習到比以往更加地感激生命的價值。(2)他們承受著死亡苦痛的煎熬，變得更加堅強，同時踵繼著接手亡者未竟的工作事項。(3)「悲劇使人們圍籠在一起」雖是陳腔濫調，卻也具幾分真實。歷經死亡事件後，往往使家族關係益加親密。(4)少數的、卻是值得注意的族群，是未能從傷痛暗影裡走出來，因而益覺生活孤寂空洞。(5)學習以自助的方式，幫助自己因應創痛。「九二一」地震失親家毀受創者又是如何敘說、標認親人震災罹難的指涉意義呢？

McFarlane 與 Van Der Kolk (1996 b) 認為，受創者在處理創傷的經驗是高度個

人性的，受創者這般的經驗歷程不可輕易地以診斷的標籤逕行掌握捕捉。事實上，創傷本身是多重構面的，同時遭受「家園重創」和有「親人罹難」的打擊，可能導致個體悲慘的不幸，使人全然放棄希望；也可能使個體在創傷事件中指認咎責或自我罪疚；也可能使個體以犧牲自我重建的能力為代價，產生向生活報復、討公道的衝動；也可能使個體將受創歸因成個人的或集體的命定說；有些則可能將創傷昇華，創造經驗知識與受苦意義，形構為助人的社會行動。因此，置身「家園崩解」按有「親人罹難」的雙重創傷經驗下，受創者轉化心創並賦予意義的方式，密切攸關著日後的存活義理。

(三) 小結

經由上述討論，本研究的問題意旨，主要在以透過田野參與觀察、深度訪談與解釋性互動論等綜合方法，深入探討「九二一」地震中遭逢「家園毀損」及有「親人罹難」雙重災變受創者的心理經驗現象和生命故事改變的多層次關係，如此徑路一方面可作為災難心理學研究的奠基，另一方面則可作為災後心理重建工作的參考。在探討主旨上，選擇「失親家毀」受創者作為對象，一方面是試圖瞭解受創者在處理喪親的悲悼歷程裡，究竟採取什麼方式重新安置自身和亡逝者間關係；另一方面，罹難者的死因係因震災而起，屬於突發性死亡，罹難現場又在自己的家園，因此，家園形成一種弔詭的置身處境，既鉤連受創者和亡逝者的線索記憶，又是引發失親苦痛的提示物。在此境況下，「失親家毀」受創者置身所在是屬於一種複雜的悲悼 (complicated grief) 狀態，更需長期持續關懷與深度瞭解，心理重建工作才會全面落实並徹底實行。

至於，在研究方法上，從參與觀察、深入訪談及解釋性互動論的角度，探討個體歷經創傷事件的心理社會反應經驗，重心不在於事件取向 (event-oriented)，而是聚焦於歷程取向 (process-oriented)，嘗試揭顯受創者歷經「失親家毀」雙重災變後，在一方面需處理死亡悲悼事件，一方面需謀慮家園重建的複雜處境下，透過何種選擇促使生活儘速歸返正常。換言之，本研究認為，在本研究界定的雙重失落狀態下，需深入探究受創者其對事件和情境的意義界定、自我和罹難者及情境變動的互



動、自我在事件意義和情境互動中的定位和轉變，以及自我如何在情境中對事件意義加以回應的角色選擇 (role taking)，以期更清楚地瞭解「雙重失落」受創者的心理社會經驗現象。

綜言之，本研究將從「三層結構」探究「失親家毀」受創者的心理社會經驗現象。首先，從心理層面，究察置身「失親家毀」主顯情境下，受創者的「內在心理」歷程，以什麼方式安置、定位對罹難者的悲悼與紀念；其次，從社會層面，考量在解釋性互動論的研究精神下，自我總是面向他者，是故，自我意識的個體內在時間性，某個程度上，也反映著社會情境裡的人際間時間性，亦即現在的時間性，和周遭他者的符號互動有密切關係 (Flaherty & Fine, 2001)，所以，本研究也將探討受創者的「社會歷程」，其如何面對家園重建的結果，及其生活信念和社會連帶有著什麼樣的變化。第三，從互動層面，在「失親家毀」的「內在心理」和「社會歷程」互動作用下，討論受創者又是以什麼樣的「角色選擇」，來回應處理創痛狀態，期使生活返常。透過如此三層結構 (內在心理、社會歷程，以及兩者互動作用下的角色抉擇) 所形成的連鎖議題，構成本論文探討主旨和分析主軸。相信藉由如此的探討，得以記錄、闡明受創者如何因應生命中的危機時刻，並反饋提供心理重建工作者之參考。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現場

本研究的田野為台灣中部某受創嚴重的鄉鎮，兩位作者自「九二一」地震發生後，即長期地並持續至今在該地區協助、參與災後心理重建的相關工作，對於該研究場域有相當程度的熟悉度與親切感。

(二) 研究時程

本研究時程為民國90年八月份至民國91年十二月份，為「九二一」事件屆滿兩週年至三週年之間的時段。所以，本研究可說是探討「九二一」災難發生後兩年至三年

間，「失親家毀」受創者的心理經驗現象和生命故事改變狀態。

(三) 研究案主

自災變發生後，研究者即以「觀察者如同參與者」(observer-as-participant)及「參與者如同觀察者」(participant-as-observer)的雙重角色，頻繁進入研究田野。是故，除了訪談資料外，田野筆記也是重要的紀實素材。然而，一開始，研究者的曝光，是基於臨床心理學家的關懷態度，而非立基於研究資料的蒐集。因之，本研究的案主俱為第一作者長期關懷的族群，而非僅是一般研究意義下的「受訪者」。因此，訪談的進行，是在第一作者和案主有相當程度的熟悉度下進行，訪談後，第一作者仍不定時探訪案主的心身適應狀態，迄今未歇。同時，研究者會將訪談資料整理回饋給案主，這樣的訪談是一種雙向式的互動歷程。

當發生災變後，受創者往往會認為她們/他們嚴格殘酷的遭遇，除非是共享經驗者，否則難以瞭解。所以，災後心理衛生工作人員早期介入，其所見所聞所感所思，往往與災難現場生還者接近，比較可以建立一體感。Freud, Lindy與Grace (1986)提出「創傷膜」(trauma membrane)的概念，意指災難發生後，生還者與其周圍邊界所形成的一種網絡疆界，這是受創個體用來保護自身再受到傷害並促進心理傷口癒合的方式(引自Myers, 1994)。由於這層創傷膜在災害發生後早期和外界尚具有穿透性，外在他者有機會可以滲入，若未能及時介入，災難膜隨後旋即縫合，再也難以滲入。所以，對於心理衛生工作人員而言，災變後需早期曝光，使居民接受她們/他們，將外來者也納入受創者的創傷膜內，以發揮心理諮商功效。否則等到創傷膜縫合後，外來的心理衛生人援救較難有效發揮角色與執行功能。本論文研究者和案主的互動，可以說是在震災後案主的「創傷膜」的內在脈絡下進行，所以，研究資料的呈現是在一種互為主體性的狀態下反覆進行。

綜言之，本研究案主為「九二一」地震災變中，同時遭受「家園崩解」和不幸「親人罹難」雙重失落的受創者，前後共有10戶受創家庭的女性受創者接受訪談，其中有八戶受創者同意訪談時錄音，兩戶不同意錄音，但仍同意接受訪談，第一作者係以田野筆記的方式記錄其相關資料。訪談的次數為五戶受創者至少接受兩次訪談，



其中有兩戶受創者訪談次數超過三次。有時雖不直接訪談受創者，但第一作者仍會伺機直接至受創者家裡進行探訪。故第一作者除了訪談資料外，亦可透過長期觀察的方式瞭解本研究案主的心身變化。本研究每次的訪談時間平均介於50-60分鐘。本研究所有案主的訪談工作，皆由第一作者親自進行，第一作者對於創傷研究相關文獻的整理亦有經驗，同時，第一作者自「九二一」震災後即長期在研究田野協助心理重建相關工作，對接受訪談的受創者有相當程度的熟悉，故整個研究關係的張力是互為主體性的，而非單向道式的傳遞訊息。

有關本研究案主的基本資料，如表一所示。由表一可知，受創者失親對象包括配偶、子女、長輩和其他具親緣關係的家族。至於家園重建概況，有四戶已經原地重建，兩戶易地重建，四戶則尚未重建。

(四) 資料解析

進行質的研究時，資料蒐集的同時也是資料分析的開始。一般而言，資料分析可以分成四個階段。首先，資料沈浸階段。研究者必須埋首閱讀研究資料，能對資

表一、本研究案主基本資料

案主編號(女子數)	年齡／職業	失親對象	家園重建概況
1.(兩個兒子)	50／水果零售商	二兒子	原地重建
2.(一子一女)	36／管理家務	大女兒	易地重建
3.(一子二女)	45／教會工作	丈夫	原地重建
4.(兩子一女)	28／管理家務	丈夫	尚未重建
5.(三女一子)	46／小吃店打工	獨子	原地重建
6.(兩個女兒)	40／家庭理髮	弟媳婦及外甥女	尚未重建
7.(一子二女)	48／自營機械修理	婆婆	原地重建
8.(一子一女)	42／家庭手工	丈夫	尚未重建
9.(三女一子)	44／家庭手工	小女兒	尚未重建
10.(兩子兩女)	62／自營冰飲食品	丈夫	易地重建

料產生完形的(gestalt)視野，找出資料的必要特性，並對資料進行初步解釋。其次，資料轉化階段。在不損及原意下，將敘說資料中脫離主題的、話題突然轉換的、贅語或口頭禪等文本加以刪除，並將與研究議題高度相關的、重要的、類似的話語，逐字逐句閱讀後，予以組織編輯起來。再次，資料命題階段。來回閱讀比較分析資料後，開始針對研究問題意識，建構相關概念或主題。同時，將具備某類主題意義的敘說段落，這些段落可能橫跨於不同的案主敘說文本，或者散落於單一案主敘說文本的各處，加以組合歸類，形構統合式的組織脈絡。最後，資料書寫階段。研究者需屢屢回頭反思比較各項田野資料、觀察記錄和資料分析的結果，並將各式資料統整匯合，進行研究報告的書寫與再書寫過程(Cohen, Kahn, & Steeves, 2000)。本研究在敘說資料的處理上，依循此四階段原則進行。

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將順利完成錄音訪談的主要受創者(以下「受創者」與「案主」交互使用，指接受第一作者探視訪談的當事人)編號後，將其敘說資料謄錄成逐字稿文本，至於未同意錄音訪談者，則整理田野筆記，如此形構本研究第一度社會建構的資料。而後，經由第一作者於研究現場的長期參與觀察及田野筆記書寫，以及對所蒐集敘說資料不斷反覆閱讀比較分析與高度反思，將敘說資料的文本抽繹為組織脈絡描述，而後從組織脈絡描述提出主軸式結構，以整合為心理療癒經驗現象的本質和意義，如此形構為本研究第二度社會建構的資料。最後，第一作者和五名接受訪談的主要受創者反覆接觸，請其對資料的組織脈絡式描述及其所驅動的概念性結構和次結構，予以交叉確認、討論與分享，她們的回饋觀點，加上第一作者長期沉浸在研究現場的田野筆記與觀察記錄互補相成，形構本研究三度社會建構的資料。本研究經過資料的反覆閱讀分析後，發現「雙重失落」受創案主一方面需處理死亡悲悼事件，一方面需謀慮家園重建處境，在此狀態下，其敘說文本的基本主結構，可以分成受創者對死亡事件和家毀情境的「內在心理作用」、受創者和該事件及置身處境下的「社會歷程作用」，以及受創者在此互動作用因素下的「角色抉擇因應」，以下分述之。

(一) 內在心理作用

當受創者的家裡有親人罹難，同時家屋房舍坍塌，受創者嵌陷於生命威脅與經驗崩解的雙重打擊。死亡意象的陰影籠罩，加上目擊家園傾塌的慘境，這樣的景象如創傷醒示物(trauma reminder)一般，不斷撞擊刺探受創者的生活世界，於是，受創者即使已然歷經地震災難的當下磨折，如今置身「此曾在/已不在」的現場，仍然會屢屢反身探究省察災難的意義。本研究發現，雙重失落受創者的內在心理作用，共有四種模態。

1. 芻思

災難事件的降臨，受創者會辯詰、詢問與應答自身的遭遇，有些面對親人死亡，產生自我罪疚感；有些嘆怨老天不公，狠心奪走自己的骨肉；有些覺得創傷的黑洞，永遠找不到替代物填補，外人難以瞭解創傷深淵的無言話語。

編號1案主是年約50歲的女性，育有兩子。第二個兒子不幸於地震罹難。案主認為二兒子的喪生，是因為他的哥哥不願和他共用房間所致，一直責怪自己若當初對此事有所處置，二兒子也不會意外喪生。案主目前對於兒子的猝逝，反覆產生高度芻思(rumination)現象。她說：

「就是個性不一樣，那時候如果哥哥有疼弟弟一點，一起睡就沒事了，睡在二樓就沒事了，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兩個都會想吵架，在那邊好好睡就好了，跑到那邊睡，我真的很愧疚，那時候沒有打算一個房間給他睡，我很愧疚，我對不起他…。那時候如果三樓的房間給他睡，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了。我就一直想一直想，那時候我為什麼不要這樣，害掉一條命，我到現在心裡還是不平靜。…唉，我就是一直愧疚他，心裡一直想不通，那時候他哥哥疼他一點，一起睡就沒事了。」

編號2案主為年約36歲女性，育有一子一女，女兒於「九二一」不幸罹難。案主本身先天性弱視，本來即是失明的高危險群。地震後，案主經常以淚洗面，因為女兒終究是案主的心肝寶貝，永遠難以割捨。案主不斷質問為什麼要有地震的發生，毀滅人們的世界。她說：

「當時就一直想說老天爺不公平，我們又沒有做壞事，怎麼會這樣子。可是我在想說，怎麼倒霉的事情都輪得到我，眼睛不好又…反正以前就是把女兒是當作我的生命…。她什麼都很好，不論讀書、什麼言行、什麼都很好，就突然走了，她就是沒有說一句話就走了。那個小孩子是我生的，除非等到我眼睛閉下去，沒有知覺了，就不會難過了，多多少少會去想，只是說現在沒有以前那麼難過了，傷心了，這永遠的痛。…很不甘願，很無奈的，怎麼要這樣子，就是說怎麼要有地震，好像要破毀這個世界。」

編號9案主為年約50歲女性，育有三女一子，其小女兒不幸於「九二一」罹難。案主覺得喪女之痛是無法用替代物彌補，而且外人的安慰話語，難以深入探底她們的悲悼之情。她說：

「人生無常。發生這樣的事，說什麼節哀順變，什麼最大的苦難都已經過去了，那是不能瞭解我們遭遇的傷害。我們當然知道經過這樣的失落，一開始的激烈悲傷將會慢慢減弱，但事實上，我們是一直打不起精神生活，生活將永遠地找不到替代物。無論用什麼辦法填補這樣的生活空隙，仍然會有一些隙縫是無法填充的。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遭遇如此重擊，整個生活徹底改變了，外人真的無法瞭解。」

編號10案主為年約62歲女性，育有兩子兩女，其丈夫於「九二一」被壓傷，送醫療治二十餘天之後，回天乏術，蒙主寵召。案主認為先生是好人卻承受如此遭遇，感到不捨與難過。她說：

「那天，這個大概六呎大的櫃子倒下來，壓到他。那天店裡面生意做到晚上九點，因為隔天還要早起煮珍珠奶茶，我就睡在和室，他睡在床鋪上，結果，那晚就垮下來了。我也不知道他嚴重到這個程度，拖了二十幾天，就走了。我很不平，因為我先生疼我四十年，這四十年中我們沒有吵架，他對我最體貼，但是你們不會相信，夫妻四十年沒有吵架這不可能的事情，那我用什麼方法，講給你們聽一聽。因為，我mc來的時候，一個禮拜之前心情都會很暴躁，我都會跟我先生講，講說我最近好像心情比較不好，我先生很好，就包容我。那我自己控制不了的時候，我去打牆壁，打到很痛，就發洩出來，就



沒事情。…但這樣恩愛的夫妻，好像一顆樹一樣，一顆樹就是這個夫妻，那長大了，這兩人就分支。只是，他是這樣好的人就這樣走了，為什麼？」

2. 拒認

有案主將災難發生解釋為運命使然，嗟嘆的、後悔的絮語不斷迴盪返響於生活世界。「如果…」的假設語氣，標誌著案主認為早知道宿命是如此規定遭逢的處境，就該積極作為以防範災難降臨。既為宿命論，實難以逆料，但受創的衝擊致使案主即使災難事發已過兩年餘，在時間延宕的現場，仍然滿佈難解的、悲傷的無奈苦痛，這並非是一種「否認」的心理機制，而是一種「拒認」(refuse to give plain explanation)的態度，拒絕運用簡約的語彙去理解受創意義。

編號4案主為年約28歲女性案主，育有一子兩女。其丈夫不幸於「九二一」罹難，案主認為如果當初把整個泥磚屋翻修，或許可以逃過一劫。目前一家四口寄居於大伯父家中，生活空間受到限制。雖說案主也想家園重建，讓子女擁有成長空間，但因經濟因素，只好續住大伯家中。她說：

「那個鐵皮屋才裝潢沒有多久而已，那時候我們總共有四間房間，原來那個泥磚屋的空間蠻大的，我們就把其中三間泥磚屋打掉，然後叫人家來裝潢，改建那個個鐵皮屋，然後隔成三間，兩間房間，一間客廳，其他一間沒有打掉，一樣是泥磚屋，空間比較大。很多人都說，本來就要打掉，怎麼沒有打掉，我先生就說留一間大間的。結果，地震那天他就在泥磚屋那間。…唉，全部都打掉的話就沒事了。」

編號6案主為年約40歲女性案主，育有兩女。其弟弟的妻子及小女兒，不幸於「九二一」罹難，而他們一家人是在地震發生前一週才搬過來案主家附近，卻不幸遇難喪生。不過，案主弟弟原先租賃的房子也倒塌了，案主困惑著命運的捉弄，搬或不搬，似乎都難逃劫數。只是，生命的境遇可以理性選擇嗎？她說：

「你剛剛進來那個空地有沒有，就在那邊，因為那是矮房子，地震時，他們夫妻和兩個小孩子，都被壓著，後來，我弟弟和他的大女兒被救出來，他太太和小女兒被壓掉了。只剩下一個女兒，跟我女兒一樣大。那時候，他們剛搬

過來，還沒發生地震，他們搬過來住，差不多一個禮拜左右而已，就發生了九二一。他之前在過去一點點那邊租房子，後來就搬過來這邊住，那邊也是倒了，這邊也倒了。可是，就算不搬過來，到時候也是可能發生不幸。命運真的很難講，也有可能如果他不搬過來，可能還沒那麼嚴重，就是說不一定，很難講。」

編號8案主為年約42歲案主，育有一子一女，其先生不幸於「九二一」罹難。案主原先是租房子，這是一棟老舊的房子，經常漏水，案主一直要求房東補牆，並加蓋鐵棚。案主的房東拖延此事，結果一場地震奪走了案主先生的寶貴生命。一直要求房東整修房舍以防意外，卻換來案主先生「向於死」的切身壓迫，更加遽案主喪夫的深沈悲悼。她說：

「因為那個是四合院，如果是鐵皮屋就不會壓死人了。我們是還沒有地震之前，我們就說要求那個房東，請他幫我們修理補牆，因為那裡常常下雨漏水，會滴雨，請他幫我們用那個鐵棚，我們會貼他們錢。結果，他有叫人家來量，過了半年都還沒有來做，誰知道，就發生了九二一。您說，人生的意義怎麼說，根本是無法用三言兩語來形容的？」

3. 依附

Freud(1957)認為，「悲悼」(mourning)與「憂傷」(melancholia)的差別，在於前者是一種對失去所愛的人所作的反應，或者是對一種抽象東西的失去之反應。後者則指失去自我指認的能力，也指涉一種關愛的能力的失去，但憂傷的主體並沒有能力去看清楚到底失去的是什麼。換言之，憂傷的主體會失去對自己的尊重，於是這種對失去客體的感受便逐漸地轉變為自我的失去(ego-loss)。是故，Freud(1957)指出，憂傷的對象正是主體自身(ego)。

編號1案主對於兒子的罹難，難以忘懷，認為自己年老了，死亦無所謂；但孩子正值青春，卻被剝奪生命。案主甚至以投射性認同的方式，夢見自己的孩子在喪禮上哭泣，似乎兒子也在悲嘆自己的早逝青春。她說：

「最近夢到他(罹難的兒子)一次。場面就是他的喪禮，確確實實是他的喪禮，就是他在哭泣，沒有看到他的臉，就只有聽到他的聲音在哭。我就一直想，



那時候死的是我就更好了，我很老了，我死沒關係啊，我兒子還年輕，唉……。」

編號2案主對於罹難的女兒，仍有強烈的疼惜感與依附感，覺得女兒的過世，似乎也帶走了案主生命的某些部分。她說：

「我覺得要靠自己啦，人家會安慰你說節哀順變、這是天災的、沒辦法的，怎樣怎樣喔、你要堅強一點。可是我們是這樣想，可是還是忍不住那悲傷啊…。像把我女兒生下來喔，十四年了，她離開我這樣子，可能以前我太愛她了，什麼都太依賴她了，可能是認為她是我的生命，突然走了，我真的那時候無法接受，還是要靠自己這樣走出來。」

編號4案主不是以睹物傷情的理由，將照片收藏起來，而是將結婚照、生活照放在床頭，也不避諱讓孩子看照片。案主表示將自己的生活起居儘量維持不變，以彷彿先生仍在世的樣子度日，她說：

「想念的話就比較好，因為我那個結婚照，以前在一起的生活照，都把它放在一個相框裡，放在旁邊，幾乎小孩子都會跑去看。我是覺得不要去把它拿去藏起來，有的時候想的時候就看。有的人是說，人死去了，照片全部都把它藏起來，不要去看他、不要去想他，我覺得這樣子是不對的，還是要拿出來，自己偶爾也是會去想說…看看他是長的怎樣，然後小孩子也會靠過來說，他們小的時候怎樣啊，和爸爸在一起的時候怎麼樣，也會看他爸爸長的是長怎樣。」

編號5案主為年約46歲女性，育有一子三女。其獨子及丈夫不幸於「九二一」罹難。平日她不喝茶，卻保留著先生生前的泡茶桌及茶組設備，每天晚上她總會擦拭茶具，同時翻閱孩子的照片。親朋好友見狀，一直擔心她無法走出陰影，或者認為她仍無法接受事實。但她認為，維持這樣的習慣，是她與先生及兒子維持某種幽香聯繫的方式。她說：

「我每天晚上就把先生生前每天必用的茶具拿出來擦拭，想像他還活著，事實上，我自己是不喝茶的。發生這樣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真的就是捨不得。那個小孩也是很乖，老天卻狠心把他帶走了，我每天看著他的照

片，一直哭，一直哭，爲什麼我會遭遇這樣的事？真的很想念他們，可使婆婆還在，年紀也大了，這樣的事情也是深受打擊，在她的面前，我都不敢提到他們(失去的丈夫與兒子)，怕婆婆觸景傷情，會受不了。」

編號8案主認爲平日丈夫與女兒較爲親密，他過世後，女兒變得孤僻，冷淡度日。因爲創傷事件導致直接經驗的延遲出現，糾葛著案主女兒與其丈夫間未竟的依附關係。她提到：

「她(大女兒)跟她爸爸講話都沒分大小，就是很好就對了，她爸爸都比較喜歡她，要去哪裡都帶她去，要買什麼他都肯，就很奇怪，買東西都是買她的，我兒子都不買給他，我說不行這樣子，買一定是要買兩份，對不對？…她爸爸走了，對她其實影響很大，一個本來她那麼親近的人就這樣離開。地震後，親戚也都比較少來往。」

編號9案主則以天堂書簡的形式，每天晚上寫信關愛罹難的女兒，彷彿女兒仍然在世般的噓寒問暖，並揣想女兒的青春遺願。她說：

「每天到了晚上睡覺時間，我就寫一封信給她(罹難的女兒)，問她在天堂活得好不好，叮嚀她要早點睡覺，就好像她還活著的時候。剛剛你說二女兒長得像我，其實，被老天抓去的那個(么女)才像我。每天我就寫信跟她說話，想知道她會不會怨嘆這麼年輕就離開人世。她爸爸嘴巴一直說要看開一點，其實，他還是會想念，他的皮夾裡，還不是隨身帶著她的照片。」

編號10案主提到先生似乎在冥冥之中預知死亡紀事，在地震發生前突然向案主提出一些約定，這些約定隨著先生過世，卻已是昨日黃花。她說：

「他實在是一個好好的先生。九二一之前，大概兩個月前，大概他是冥冥之中，那個時候他這裡痛，我們都認爲是神經痛，都是以神經痛來醫，那時候他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講，妳這四十年來，我都沒有什麼幫妳，只有知道妳病了，拿茶、拿牛奶、拿藥給妳吃，其他我不曉得病痛是什麼。他之前四十年來，很少生一個小病，生小病還是我拖他去看醫生，那他就跟我講，要跟我約三個事情，他說：你答應我三個條件。我說：這麼嚴重，什麼事情要答應你三個條件？他說你講，第一，就是把我們的地賣掉，我一定要把妳的病



治好，好不好？我說：這當然好，有什麼好嚴肅啊。第二，他說：我們就是回大陸去，去拜祖，我有回過去。回過兩次喔，他說：去看爸爸媽媽、再去回家鄉一次，帶這些孩子回去，認祖歸宗。我說：那沒問題。第三呢，他說：我們這個店(冰品店)不要理它，我們就出去旅行，到處去旅行，好不好？我說：好啊，我們年紀也不小了，現在是應該要享福了。他說：那妳要跟我打勾勾喔。我說：好啊，那打勾勾喔。就打勾勾，還蓋指章。誰知道，後來就發生了九二一。…他是很忍耐、很忍耐，有修養、很有修養的一個人，你再怎麼罵他，他是無論你是收破爛的，他也跟他打招呼、也跟他握手，你再高貴的，他也一樣，所以，也許耶穌就直接帶他去天堂了。」

4. 昇華

張志揚(1999)認為，「創傷記憶」中的意識總以為自己沒有意識到最好的，只要意識到最好的，自己就不會再身受其害了。或者，這種意識汲取了苦難記憶，但作了一種悲劇性的立義：意識所意識的終極目的是至善的，只是實現的過程中難免會有差錯，甚至有些差錯，正是真理自我構成的步驟與代價，因而犧牲是值得的。它需要某些人做出犧牲。在此語境下，有些受創者會以逆向的思考方式，昇華受創意義，進而體驗受創的深層理路。

編號3案主就提到受創之後，不要一直回想過去，要努力看前面。而且，他認為同為天涯受創人，將社會福利均霑於更需要幫助者，可以發揮大愛。她說：

「之前，我對人生沒有什麼盼望，也沒有什麼計劃的，一點盼望都沒有，清楚以後，我整個人都又活起來，又活潑起來了，我想我有能力去幫助像我這樣的人，所以我那天去找社會局的人，因為社會局的人之前有打電話給我，叫我去領什麼一個月的補助，我說把那個錢給比我更可憐、更需要的人，畢竟我的孩子比較大，雖然說費用也很高來說，最起碼我的孩子比較大。我們可以節省，我們就節省起來，他說恭喜你，聽妳講話的口氣，妳已經從陰霾中走出來。我說對，我好像那個障礙好像有跨出去了，不像之前這樣子。然後那天我就找社會局的說，我說我可以找朋友出來了，可以到我家裡來，來

我這裡分享，不要再一直想過去的，要忘記過去，努力看面前。」

編號7案主為年約48歲女性，育有一子二女，其婆婆不幸於「九二一」罹難。案主的婆婆在地震發生前即已洗腎多年，不良於行，因此案主對於婆婆的遭遇較能寬解。案主的公公幸運地逃難成功，案主認為這是冥冥之中，好人有好報。

「我公公真的是人家說的，他也是人家說好心有好報，真的是好人…。像我們旁邊這條路，本來是一片地，下面的人都不肯轉讓，我公公拿出來五分地，整條路都是我公公鋪的啊，那時候下面的人都不要給人家鋪到，有的人不肯鋪，他就私下拿錢說給他們買，就叫他們說你是捐贈出來的，真的是好人，這次他就逃出來了。婆婆就沒那麼幸運。當時，我們那邊的人都跑出去，只有我們這一家人沒有出去，外面的人一直呼叫，他們拿樓梯給我們走下去，等第二次餘震我要出去的時候，那個縫只剩下這樣，我家我是最瘦的，都爬不出去，因為那中間有餘震，房子就又倒，到第二天，婆婆就已經救不起來了，真的人家說的，做善事還是有善報啦，我婆婆他沒辦法，她本身就洗腎洗兩年多了，就去逝了，所以說還好，像我們大家心情都還比較平衡，因為我婆婆，我們隨時就已經有心理準備，她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走。」

編號7案主又提及，房子雖然倒了，但若地震前沒有整建的話，死傷一定更為慘烈。因此，家園重建的過程，使案主體會到犧牲是有代價的。她說：

「地震後，我們覺得生活變得更樸實，房子雖然倒了，婆婆也不幸走了，但我們是值得的，因為我們如果那個房子沒有建的話，我們一定不只死一個人，因為我們那個屋瓦，我們原本房舍都是木板做的，而且上面都是蓋瓦，如果大家都住在原來房子，瓦一定是掉下來，就不只死一個，你沒有死一個的話，也是輕重傷，所以我先生說很公平呀，政府給我們的人命一百萬，我們算一算也是變成一百萬命買回來，不過我們這樣花的很值得(房子倒了又重建)，所以我們心理就比較平衡，用這樣子來算覺得很有價值，不然一定不只這樣傷亡。」

由以上資料顯示，面對失去親人的家園，受創者和家人的關係產生移位。若死者是受創者的配偶，為了養育子女而堅強存活，受創者的角色轉變成為家庭生計支



柱，但對亡夫仍然充滿「音容宛在」般的依附。若死者是受創者的子女，思念的軸線纏繞，家屋少了殷望兒女成長的身影，受創者心中充滿不捨和難以切割的連帶關係。若死者是受創者的父母或長輩(如公婆)，受創者可能存在激烈的控訴，卻也可能將死亡事實昇華，尋求新意義(如年邁往生，也是種寬解)。然而，這些敘事背後不變的基調是，創傷拒絕固著的、簡約的解釋，無法完全透過語言的描述呈現樣貌，必須持續地關注和傾聽。

(二) 社會歷程作用

災變的發生，造成的死難失落，往往給出了芻思念憶的幽邈空間，進而形構了創傷的謎底黑洞。Caruth (1996) 回應創傷並非僅僅帶有一種毀滅性的效果，同時也是一道生存的謎題。她以為唯有將創傷認為是一種介於毀滅與存活之間的弔詭，我們才有能力去指認創傷經驗裡，尚未被理解的那一部份。對Caruth (1996) 來說，生存的行動是一種掌握其生命的威脅那種必要性和難以忍受感的自我面質(self-confrontation)。面對創傷的生存弔詭性，受創者不僅透過內在心理作用寬解心創，更需要透過社會歷程作用探解受創意義。

1. 弱紐帶的形成

相較於家庭關係或親密朋友的強連結作用，社區的或宗教的支持力量是以「弱紐帶」(weak tie)的方式呈現。這樣的支持力量，雖然終究無法或無須發展出親密關係，但當強連結被創傷所阻斷瓦解時，弱紐帶仍能提供穩定的支持力量(Williams, Zinner, & Ellis, 1999)。

編號3案主為年約45歲女性，育有一子兩女，其丈夫不幸於「九二一」罹難。案主在先生過世後，萬念俱灰，鎮日以淚洗面。後來因緣巧合接觸到基督教，從此改變自我，用喜樂的心去接受遭遇的災難，篤信縱使在「人世有患難，在神裡面是有平安」。她說：

「沒有碰到這個災難，我也不可能去認識主，套句聖經裏的話，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真的在完全無助、完全失望的，可以說是絕望那種地步，再重新

站起來，也真的蠻感謝神，祂的力量真的蠻大的，也把我們家的關係拉得距離更好。之前我也會一直覺得說怎麼會這樣子，我們又沒有做壞事，怎麼會輪到我們…。後來，就是我接受基督以後，我就覺得說好像心裡面真的是有那種平安，不再恐懼，真的不再恐懼。然後就是在教會裏面的弟兄姊妹也是蠻關心我，就一路這樣陪我，一直忘記那時候，然後就是從聖經裏面讀到更多的話語，原來我們是還可以用喜樂的心去接受，縱使在人事有患難，在神裡面是有平安。就是你要怎麼來面對那種的苦，真正要忘記掉，真正的要從心裏面拿掉，重新接受，我要過新的生活。」

案主3的兒子剛退伍不久，目前在一間工廠上班。他本來因為父親不幸遽逝，以及家園瞬間灰飛湮滅，哀慟逾恆，失意消沈，抽煙喝酒、夜不歸宿。但看到媽媽接觸上帝後，整個人開朗起來，彷彿變了一個人，故也嘗試認識基督。最後，也受洗成為虔誠的基督徒。他說：

「因為這個傷痛太深了，說真的很難，不是說一天兩天就可以改變，或是一年兩年，真的很難，因為如果說換做你們的話，一個45秒，可愛的家沒有了，你的親人沒有了，真的是很難受的打擊。那時候真的是記憶深刻，我那時候還在當兵，回來的時候跑去東勢大雪山林場那邊，去找屍體，去找我爸爸，我一個一個這樣找，那個感受真是很難忘，真的很難忘。接觸上帝，讓我覺得就是突然可以對這件事釋懷，我覺得是蠻大的一個幫助的。」

編號4案主則認為自己還年輕，不急著為自己的信仰定位。但因為案主過去生活選擇上的親近性，案主比較傾向去接觸佛教或一貫道。她說：

「我自己覺得，因為他們那個基督教是比較屬於他們外國的，我們自己台灣人還是都要拜拜什麼的，因為我覺得那比較屬於我們自己。…因為從小，我媽媽就帶我去那個佛堂，就是佛教那種或一貫道的地方，所以說現在有時候，我就會去接觸、去聽一聽。那個教裡面的，有的時候幾乎都是以講要我們學好、為善、多吃素為主，我們自己的那個心有沒有定最重要，心有定，講什麼都一定會去做。…因為人不一定說那麼快就要找到什麼寄託的，因為我覺得很難講，人都會變的，你不可能說一生中都是信仰那個，因為我還年輕，



不可能說、除非我已經四五十歲了，然後心又蠻定的那種，我就會考慮說定下來，給自己一點信仰，現在還太年輕。」

編號10案主是透過天主教面對喪夫之痛，她提到：

「我心靈的安慰就是天主、聖母瑪莉亞，也許耶穌，要不是這宗教救了我，因為我曾經尋短，可是，聖經上說，自殺就是地獄。本來，我一心一意是想要尋死，跟我先生相聚。…現在，我的想法是這樣子，我是說人在世上很苦，可是他在天上很享福。我現在也是想，我全心全意就是託付在天主身上、耶穌身上，我只要這條路，這個世界上的榮華富貴，我不要享。」

2. 家園重造的彈性力

McCarthy & Edwards (2001)指出，「家庭」(family)的意義不只是一種對偶的關係，更是一種認同感、共體性與歸屬於某單位的意涵。家庭的彈性力(flexibility)，指家庭成員面對壓力或受創處境時，因勢利導、通權達變的狀態。面對家園受創的衝擊，重建家園成爲生活上的重要事項。然而，有受創者寧可住舊房子，百般不捨新房子的落成是以家人的犧牲爲代價。有受創者則認爲家園一日不重建，就猶如失根的蘭花，或者認爲象徵著心理上的不安定感，故想盡辦法以家園重建爲上綱目標，擁有一個家，就是一種「在世存有」。有受創者則礙於現實的無奈，只好繼續寄人籬下，過著一種「大家庭」般的生活。面向親人永恆缺席的家園重建樣貌，形構著受創者差異的心理經驗現象現象。

編號1案主認爲以兒子的犧牲，換來一棟原地重建的新房子，是無法等價的。

編號2案主也認爲寧可女兒活著，也不要剛落成的易地重建新房子。她說：

「大家都說住新家很高興，可是我覺得，不要地震更好。我寧可住以前的舊的房子，也不要住這間新房子。如果沒有地震，沒有失去小孩子的那更好，這樣，我寧可要女兒也不要住新房子，可是這也很無奈，沒辦法。…這陣子，我剛住來新家的時候比較會夢到她。好像她跟我說，媽媽我們住新家了。在作夢的時候覺得很快樂啊，像以前那樣子，沒有地震的時候，大家在一起很快樂，可是…我夢起來的時候，不對喔，現在是在這邊，所以很難過的。」

編號3案主則認為住在原地重建完成的心家，感覺比較踏實。她說：

「新家覺得蠻好的，自己比較實在的感覺，在外面住，好像失根的蘭花在那邊漂浮不定啊。…妳一定要去面對，妳失去一個丈夫，一定要去面對嘛！現在唯一家對我的感覺就是說，不再像住外面，再忙什麼，我今天回來就是，再忙我就是爲了這個家。在外面好像就覺得說不是自己的故鄉，不是自己的家那種感覺，好像回到這邊才是真正的家。雖然說妳要面對失去一個伴，妳也是要去面對它。不能再說怎樣，現在唯一就是要等這兩個女兒畢業，我就比較輕鬆，這個房貸，我們有跟政府借錢，房貸就等孩子長大了，賺錢慢慢再還這樣子。」

編號7案主認為若當初搬進去住組合屋，一定會失志，所以，無論處境如何困難，一定要想辦法家園重建，才會讓家裡的長輩感到寬心適意，目前家園也已經原地重建完成。她說：

「最近因爲我要蓋那棟房子，我先生他也不肯，因爲說現在都沒有錢，沒有錢要建的話，小孩子又要讀書，會很辛苦。我說不行，說你如果沒有建的話，老人家(案主的公公)心裡會不平衡，你給他住這邊，因爲他住上面住習慣了，住這裡你要找朋友，他都要騎摩托車上去，因爲他都固定只有到我們老家隔壁那個建材行，他的老朋友都住那邊，房子沒重建，我看他也是整個人很憔悴，我跟我先生說不管怎麼樣你都要建起來，慢慢再來還。現在，公公又回到老家，感覺也比較開朗。…他們(兩個孩子)是因爲讀書的關係住台北，所以才逃過一劫。最初他們是說叫我們去住組合屋，我說不行，組合屋住下去人會失志，一定會失志掉，我說不行，我說倉庫那邊我們不要做生意，那邊清一清大家睡，還可以睡，可以煮飯就好。」

編號4案主家園則尚未重建，她也提到，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回到老家，她也希望寓居於自己的家園，不必像現在一樣寄人籬下。她說：

「未來希望…當然是自己有一個家這樣子最好了。相處比較有那種空間，然後生活比較沒有那麼的受困、受限制。…我沒有那麼多錢，去買房子，我就跟他(大伯)說，再怎麼樣的話，如果我們有機會可以回老家就搬，然後他就

說，可是回去那邊的話，妳自己一個人的話女孩子，不好吧！他是怕人家說，好像是大嫂大伯趕我走。」

3. 「思」與「說」距離的位移

當受創者缺乏他者的接應，主體本身無法接受死亡事實所帶來的生活失序，因此，難以離斷生者與死者間的經驗，造成創傷的符號無法進入象徵的層面，而在現實層形成心理能量的「固著」(fixation)或「阻塞」(blockage)狀態，將造成創傷黑洞的擴大。換言之，當受創者「可想可說」其遭遇時，心理能量得以位移，較能產生適切的心身狀態；若個體在「思念」和「敘說」之間無法相互對應，置身受創處境，產生「只想不說」或「少說多想」或「不想不說」的落差現象，將致使生活適應欠佳。

編號1案主因為缺乏先生的同理支持，只能以隱瞞悲傷的方式面對喪子的創痛。她說：

「我先生他現在都不跟我一起睡。我這樣下去(每天哭泣，想念兒子)他要工作睡不著。我就沒辦法，一直想說那時候為什麼不要再弄一個房間給他；這樣一直想就哭了，為什麼我這樣害他一條命。心很痛啊。叫我一下子都忘掉他，很困難啊，如果我先生會做人的話，會多安慰我，那我就不是更好嗎，你就跟我作伴不是更好嗎。…他(丈夫)不喜歡看到我這樣，我現在好像隱瞞式的，我在哭就不要給他看到，我就晚上在被子裡面哭。」

編號3案主的女兒則因為有教會兄弟姊妹的支持，所以，逐漸可以坦然建構其父親的遽逝意義。她說：

「我們也會再談起地震的事。之前像我小女兒的話，她很怕再提起，要是說親朋好友這樣再提起，她會不高興，她會你們不要再說了，會不高興。現在，小女兒也能夠和親朋好友講地震的事，不像之前那麼反彈，像你剛剛說地震週年，他們辦什麼活動、歌唱那些，對我們來講，那時候我還沒有信主，我是覺得說好像在我們的傷口上灑鹽，你們這樣做對我們有傷害。現在不會這樣子，像去年的921也是，在太平為她爸爸作一個追思禮拜，也是弟兄、教會的教友來家裡作禮拜，我是感覺不錯，不像以前我整個臉沒有辦法笑出來的

時候，孩子也不敢接觸我，包括朋友、親戚也不敢來接觸我，我沒有辦法笑，誰敢跟我談話，不敢。我是覺得自己要先去接納、先去把心情放開。」

編號 4 案主因為地震後成為守寡少婦，親戚擔心她受騙貿然改嫁，希望案主接受宿命，不要再與人論及婚嫁。她的姑姑並認為過去就是因為案主不聽勸告，太早就決定嫁為人婦，才導致現在守寡，這樣的社會關係介入，使案主生活形成負面作用。她提到：

「我覺得應該要互相啊，有那個緣分喔，很難講，不一定的，有時候如果我姑姑回來管，他們就會怪我說，都是妳啦，那時候年輕怎麼不聽話，…妳媽媽說妳不可以那麼早嫁，妳看那麼早嫁，先生先死掉，我說，那個是意外…，他們卻又害怕我再改嫁。姑姑那個觀念就受不了，每次聽到她這樣子一直講，我就說，這個以後的事，不要講了，我現在還年輕，我還是把小孩子先看好，有這個緣分，到時後再說。…我是不會去一直找說，我要找男的，我是不會這樣子。」

綜言之，本研究由敘說資料和田野記錄交叉比較發現，面對災難危機，人們的生活慣性促使人們希望儘快可以尋復到曾經親密共知共存的時空感，宗教活動或其他「非家族性」支持力量的現身，形成一種弱紐帶，提供了生活斷裂感的支撐點，這已經不是一種迷信語言，而是藉由宗教的「淨化」經驗，重新將失落的熟悉感找回來。而當家園已經「原地重建」者，比「易地重建」者或「尚未重建」者，其與家族情感和亡者影像的關係得以重新締結，故整體心身適應狀態較佳。除此之外，當受創者有周遭他者的接應形成傾聽空間，受創者對置身處境的「思念」與「敘說」得以在此他者的回應下同頻揭露，說與思之間不至於產生落差，則受創者同樣有著較整全的心身療癒狀態。

(三) 角色抉擇因應

Calhoun & Tedeschi (1998) 指出，「後創傷成長」的概念，同時指涉一種結果與歷程。她們認為，個體會歷經「後創傷成長」的經驗，通常引發的事件是震源般的 (seismic)，亦即事件得以強烈震撼搖動了個體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可能瓦解拆毀了



個體的世界觀。然而，當個體的世界觀基底遭受動搖，並伴隨著心理苦痛之際，往往也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一種「後創傷成長」的入口，個體的角色抉擇也有所改變。

1. 豎立生活新里程碑

編號2案主指出因為災變，促使自己斷然決定進入盲人重建學校重新學習新生活。她說：

「現在，還是決定要去(視盲重建醫院)，如果沒有地震，我女兒沒有走，我一輩子不會去，以前會想說要去，可是我願意為小孩子付出一切，無怨無悔的，可是地震後什麼都不是了，真的，什麼都要靠自己，以前什麼都靠女兒，結果女兒走了，現在，就可能就要轉變。」

編號2後來因為失眠禱告，從而與上帝結緣，自後改變了生活形態。她說：

「(地震後)晚上睡不著，我說我晚上睡不著怎麼辦，有一個學長跟我說，妳可以禱告，讓耶穌幫妳睡著，我就開始禱告，那時候我不會啊，我就說各路神明、觀世音菩薩、後來才說主耶穌，說讓我晚上好好睡，過一下子就入眠了。過一下子，就聽到叮噹響的聲音啦，這就是那個耶穌的聲音，可能我跟上帝有緣，這就是要召喚我的意思，後來我就改變我。…我覺得我的生命很需要這個耶穌的信仰，以前我是沒有信什麼教這樣子。」

編號3案主的兒子於地震後，因為感受到承蒙上帝的照應，使他徹底改變人生觀。他提到：

「今年最大的改變，就是信了耶穌，也不曉得是為什麼，因為就是信耶穌改變的，之前就是說你要走出這個陰影，真的很難走出。因為地震是臨時發生的，幾秒鐘就景物變掉了，真的是很大的傷害，還有遇到事情，後來親戚鄰居間的冷言冷語，說什麼這個家沒有男主人了，或者改信基督很奇怪的話，在今年四月以前，其實我是蠻憤世嫉俗的，因為為什麼我遇到這事情，為什麼親友還要這樣對我們，我幾乎什麼三字經都出來，我遇到不爽就是這樣子。晚上出去，就跟同學打麻將、喝酒，就是這樣子逃避日子。其實這樣子，過得真的是蠻痛苦的。」

編號8案主則認為面對失業困局的求職競爭壓力，如果社會能夠持續關懷，這些地震後的單親家庭自身，也涵蘊著重新站起來的能量，她自己目前則肩扛著母兼父職的生活新角色。她說：

「現在畢業生又出來了，求職更加困難。我們以工代賑就結束了，到處都失業。我覺得我們像別的鄉鎮，看那個新聞報導，好像政府捐一點錢出來給他們，幫助他們創業比較好。不要像這樣以工代賑，要幫我們創業，學一技之長，開什麼單親的自助餐，全部都是單親媽媽之類的，這個比較有意思，至少變成你有一技之長，不像沒有掃街了，什麼都不可以做。如果有人願意持續關懷，我們其實是有很大的力量想要自己重新站起來。」

2. 從受害者轉為助人者

編號3案主認為必須從內心破除喪夫的悲痛陰影，並且角色涵轉為助人志工，漸次回歸日常生活。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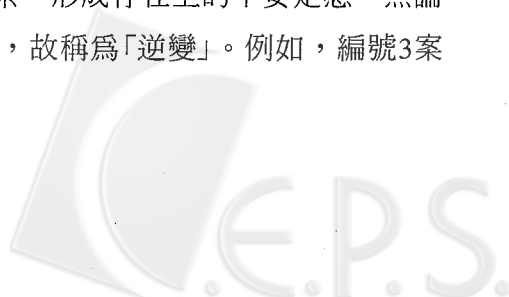
「我現在也是開始在找工作，不過我也是面對能夠有工作就做，可能就是星期一去做農會介紹的種樹，但也不能說依靠這個工作放棄其他的工作機會，總是要努力把握機會，最近成為教會的關懷志工，主要定期探視獨居老人。但是，要忘記喪親的苦痛，努力的工作，我覺得說真正要從內心裡面，從內心裡面這樣子來拿掉，破除那個陰影。」

編號6案主則在空閒時，以極微薄的酬勞，到養老院幫忙煮飯和清掃，同樣體現著從受害者轉變為助人者的角色更替。她說：

「我就是平常下班才去(養老院)，去做兩個鐘頭，幫忙廚房工作，分菜、然後就幫忙掃、洗碗、拖地，這樣子兩鐘頭。平常那樣，星期一到五，禮拜六就休息…，就另外有人在煮飯。」

3. 生活信念的逆變

遭遇災變後，受創者的生活信念因而產造變化。有人彷彿向死而生，轉向正面信念，有人卻因既有信念瓦解卻尚未建構替代體系，形成存在上的不安定感。無論如何，這樣的信念轉折，都因遭遇震災逆境而生，故稱為「逆變」。例如，編號3案



主認為雖然地震奪走了丈夫的寶貴性命，但她在宗教信仰的接引福證下，逐漸走出喪夫家倒的陰霾，同時，全家人也在災後皈依基督教，進而以逆境中存活是一種幸福的信念，面對災變。她說到：

「怎麼講，沒有碰到這個災難，我也不可能去認識主，也是，套句聖經裡的話，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真的在完全無助、完全失望的那種，那種可以說是絕望那種地步，再重新站起來，也真的蠻感謝神，祂的力量真的蠻大的，也把我們家的關係拉，拉得距離更好，之前我也一直，怎麼講，會一直覺得說怎麼會這樣子，我們又沒有做壞事，怎麼會輪到我們…。然後孩子就是看到我這樣子，不再自己愁眉苦臉，然後重新生活，有一陣子兒子也是很悲憫，因為就是家庭變卦的關係，然後我們關係處的很不好，我就靠著禱告，我兒子也是這樣變好，回到媽媽的身邊，也跟媽媽是有這樣的一樣信仰，覺得說這個力量蠻大的。」

編號5案主，同樣轉向正面的生活信念。她說：

「覺得平常，我們跟你講的時候，「人在做，天在看」，平常叫人家按部就班的話，人家都不會去踏實，都喜歡走投機的。可是地震的時候給我的感想就是，你平常按照宇宙的這樣去修持，就遇到了，還是可以逢凶化吉。可是我覺得還是，人還是容易健忘啦，他還是沒有知覺說修持跟地震這樣聯想。其實我覺得有關聯，所以覺得說，更要腳踏實地去，這樣一步一步的踏實。然後地震給我感覺就是說，因為我們是地震災區，所以我們本來是一個很封鎖的區域，可是外來資源那麼多，可以趁這個機會大家趕快充實，如果有些人他很積極要充實，他因此而受益很廣大，如果也很深入的去體會的話。可是如果沒有的話，就傻傻地過，也是跟一般人一樣啊喔。所以我，地震給我的影響，對我來講我還是受益的。」

不過，編號2案主則因為一場地震，動搖了個人信念，也改變了其和生活秩序的連續感。她說：

「本來想法是說她(女兒)會一輩子好好的在你身邊，或是說你可以看著她長大，可是突然一場地震就剝奪一切，剝奪一切你的信念，你本來會認為說這

個世界應該是安全的，那…好像這個世界應該都還是可以按照你認為說，她那麼乖，那麼善良，像小天使，這麼好的孩子，應該是會有比較好的…結局，其實人都會有一個生活信念啦，那這個信念因為一場地震，就讓你整個…等於是把你抽掉了，就整個把你打亂了，那打亂之後，你跟這個世界或跟你周圍的人的關係，就會比較容易產生那個不安全感。」

編號10案主則提到，因為「九一一」事件的衝擊，鞏固了她認為生命無常的信念。她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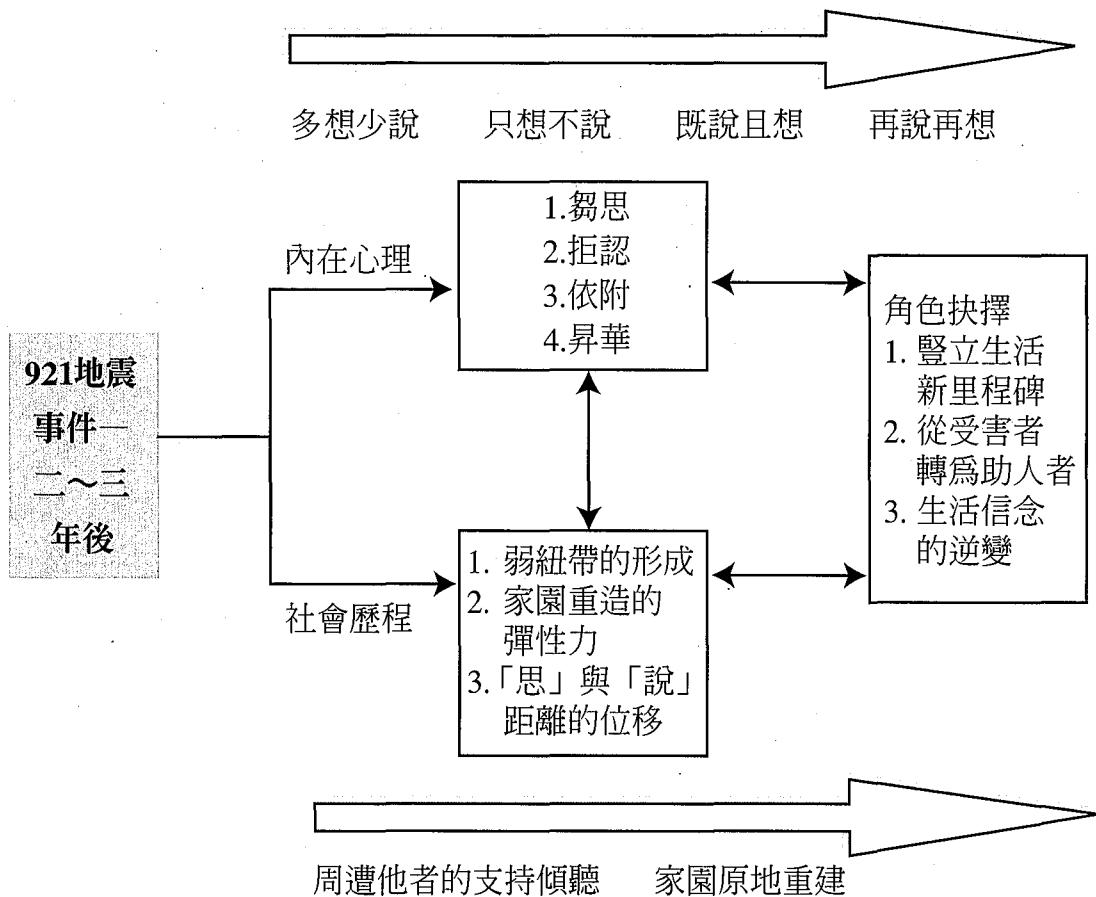
本來我覺得好像到暑假的時候，感覺上好像快要兩週年，覺得好多了，可是那個「九一一」突然間又這樣蹦一下，整個全球的給我們的震撼蠻大的，然後又經濟的經濟的關喔，看到我們周圍好多人本來就找不到工作，然後現在又更多人失業了，然後就覺得好像整個我們周圍的世界都變得很亂的樣子，好像大家都有蠻恐慌的的心情…。我也覺得人生無常，就感覺說「九一一」又讓我們把那個「九二一」的經驗重新又再喚起，就是那種很很恐怖的，已經開始慢慢有點放掉了，然後現在突然間又把它抓回來了，我原先第一次看到「九一一」那個畫面，是從電視上看到的，然後就在想說，嗯…這跟我們那時候地震差不多一樣。只不過那時候我們看不到自己，現在我們是看到了，那我們就好像原先在這畫面裡的某一個點，然後忽然間就這樣，那個生命的就好像，突然間就會消失的感覺。現在常有這樣的信念。」

五、綜合討論

經由以上雙重失落受創者心理經驗現象的分析，可知本研究受創者雖然共同面臨一場大地震，而且造成「家毀人亡」，但彼此間心理經驗轉化模態卻顯現出個別的特性，本研究結果構念圖，如圖一所示。

由圖一可知，受創者在「內在心理作用」方面，顯現的經驗現象包括「芻思」、「拒認」、「依附」和「昇華」。當受創者展顯過度「芻思」，往往會不斷回想死者生前的種種，類似喃喃自語，卻很少向人訴說，是一種「多想少說」的狀態。當受創者呈顯





受創者的整體置身處境

圖一：本研究結果構念圖

「拒認」現象，因為尚未找到自身遭遇的完形意義，語言不足以描述，所以，是一種「只想不說」的狀態。無論是「多想少說」和「只想不說」，當案主較少敘說受創經驗時，整體的心身適應相對欠佳。當受創者採取「依附」作用，想像亡者和自我的對話，想念中又有說話的感覺，這般音容宛在感的力量，促使案主生活習慣或居家安排盡量維持猶如往生者仍在世的樣子，這是一種生者與死者維持互動關係的幽杳形式，也是一種自我認同的樣態，案主顯現「既說且想」的狀態。而當案主涵轉創傷經

驗，將受創賦予人生哲學的意義，並樂意與人分享，這是一種「再說再想」的狀態。無論是「既說且想」或「再說再想」，重要的是案主得以敘說自身遭遇時，整體的心身適應相對較佳。因此，歷經「九二一」地震兩年後，有些受創者得以在歷經創傷之後，培能轉化自身的遭遇；有些則依然停留在悲悼思緒裡，尚待細膩的傾聽與持續的關懷，以期挖掘出未說出的聲音。

至於，在受創者的「社會歷程作用」方面，呈現三種經驗現象，「弱紐帶的形成」、「家園重造的彈性力」以及『「思」與「說」距離的位移』。因為「內在心理作用」和「社會歷程作用」彼此間是具「相互性」的關係，在此處境的交互作用下，受創者的角色抉擇因應為「豎立生活新里程碑」、「從受害者轉為助人者」和「生活信念的逆變」。Pennebaker & Harber (1993) 指出，重大的災變會同時使個體成為受害者而尋求他者支持，也可能使其成為其他受害者尋求支持的來源。究其因由，集體式的災難會對社會生活基本質素的重擊，因而使人我之間依附的鏈結遭受破壞，同時損害了互為共同體的感受，許多人在危機發生時與發生後是相互聯繫在一起，而且互助合作 (Myers, 1994)。更具體而言，弱紐帶的建構組結 (像本研究案主所加入的教會組織)，往往會發揮著看似無形卻巨大的力量，猶如 Tedeschi & Calhoun (1995) 所指出的，藉由宗教信仰與宗教活動的昇揚，可以提供一種替代性的創傷事件控制模態，即受創者透過宗教信念的「鞏固」和宗教活動的「彈性」，轉化事件的意義 (如發生這樣的悲劇是上天的考驗；親人的罹難是犧牲小我的活菩薩，拯救世人苦難)。Wurmser (2000) 指出創傷力包含一種「悲劇性轉化」(tragic transformation) 現象，意味著個體不幸歷經強烈苦痛或大規模衝突或嚴重創傷後，經由頓悟、行動或主動修補 (active work) 等方式，而產生一種巨大改變 (profound change) 的歷程。無可諱言的，這樣的悲劇性轉化也許涵蘊著神奇的 (magic) 成分，但我們確實見證了有些案主豎立新的生活里程碑，其心身適應狀態漸次恢復常規。由此，比較國外相關研究，本研究發現亦指出創傷不只是個人式的苦難事件，更具有集體性的社會意義。

進一步來看，案主得已在「思」和「說」之間產生零度距離，並且正向轉化社會關係，豎立生活新座標，重要的關鍵經驗轉折為「周遭他者的支持傾聽」，以及「家園原地重建」。從敘說資料顯示，當案主得以家園原地重建，生活網絡又能夠形成弱



紐帶環節，新支持力量的介入，往往會使受創者一方面整理思索受創經驗，一方面會向他者敘說遭遇，因而對受創生活採取較積極的行動策略。再進一步分析，得以家園「原地重建」，且又有「弱紐帶」的形成，案主的心身適應狀況最佳(如案主編號3、5、7)。家園「尚未重建」，但有「弱紐帶」的形成，案主的心身適應不至於惡化(如案主4、6、8)。但家園「易地重建」者，案主的心身適應狀態顯得最為不佳(編號2、10)。Bachelard(1969/2003)曾指出，人類的生命中，家屋盡力把偶然事故推到一旁，無時無刻不在維護延續性，如果沒有家屋，人就如同失根浮萍。然而，失去親人後的家園易地重建，往往改變著受創者和家人、他者的關係，生活經驗的綿密性突然轟響著更巨大的斷裂。由此，置身家園易地重建境況下的案主，不但需要處理死亡悲悼經驗，更需要調適居家新環境，而且是一個切斷家族情感鍵結的新環境，這類型的案主面臨著如此多重的壓力和失落，值得持續予以關注。

至於「周遭他者的支持傾聽」和「家園原地重建」，何以成為心身適應的重要轉折點。可能的解釋有二。一項理由是，Giddens(1990/2000)認為，「反思性」是對所有人類活動特徵的界定。人類總是與他們所做事情的基礎慣常地「保持著聯繫」，這本身就構成了他們所做事情的一種內在要素。Giddens(1990/2000)進而指出，「一切依歸如常」是信任和本體性安全得以穩固的基本要素。受創後，無論是宗教的介入或其他社會力的奧援，都會提供弱紐帶的功能，並且營造傾聽空間，案主得以「再說再想」其心創經驗，因而使案主的生活漸次恢復秩序，感受到一切如常的信任安定感。另一項理由為，Pollack(2003)的研究指出創傷事件在特定區位(site)的發生，具有三重不同意義。首先，在特定區位發生的創傷，會使個體和這個地方產生特殊的負向連結(negative associations)。其次，這個區位先前的意義和目前的境況已然產生落溝(disjunction)，而此落溝會增加存活者既有的巨大受苦經驗。第三，區位在個體創傷復原歷程裡，具重大意涵。Pollack的觀察論點雖包括負向意義，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現場見證的負向連結外，現場位址背後所象徵的生活傳統和記憶空間意涵，經常成為受創者操持居家的重要安定力。例如將罹難者的遺體埋葬在悲劇發生的地方，可以使得個體經由悲悼的歷程記憶追念亡者，同時重構創傷故事，進而再恢復存活者和生活社群的聯繫性(connection)。因此，在創傷發生的區

位，紀念追悼罹難者，具象著恐懼的根本弔詭(fundamental paradox of horror)。一方面，存活者意欲否認恐懼，試圖遺忘悲劇的發生現場。另一方面，存活者又想大聲說出恐懼，以抵抗恐懼的侵擾生活常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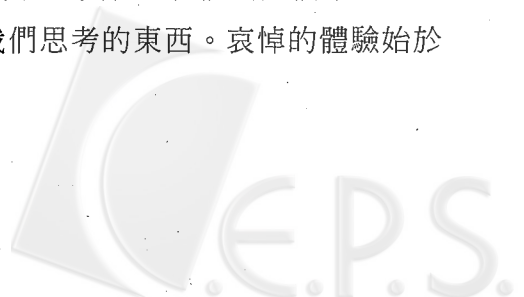
由此，本研究認為，家園原地重建者，固然會觸景傷情，但同樣也聯繫著過去生活經驗的諸種心身情態，反倒讓案主產生安定感。進一步說，擁有一個家，不只是指涉具體的房舍建築竣工而已，更為重要的是，家庭承載著受創者的心理歷史記憶，更是一部宛在的遺產(living legacy)，紀錄著家庭成員通過生命儀式的點滴。一場地震不僅摧毀了人們的存在邊界，更塗銷瓦解受創者的生活傳記。受創者眷戀舊家，家園原地重建時盡量把房舍裝潢擺置一如震前，無非是喚起過往那樣的熟悉生活迴路，這是建構「後創傷認同」的一種形式。但原地重建作為一種創傷提醒物(trauma reminder)的恐懼感，總要有管道述說，這又涉及能否形成「弱紐帶」的他者力量介入，這些因素環扣著攸關著受創者心身適應的品質。是故，心理衛生工作人員，在災難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療介入時，能夠對案主體諒伴行、共苦如苦、細膩傾聽，多能協助案主轉度遭遇危機，這是吾輩可以著力的重要關鍵節點。

六、小結

(一) 本研究成果意涵

Crossley(2000)指出，經由敘說的方式，故事在時間向度上開展了人類行動的象徵化意義。當個體面臨創痛時，在世存有的根基頓時喪失，猶如跌宕於無底的深淵，「理所當然」的過往不再合理，在此狀況下，個體經常產生「今我非故我」的認同迷離，彷彿墜入不知身處何方的語言破碎境地，試圖快速地以語言統合敘說災難經驗往往成為另種災難，Frank將這般生活失序的狀態隱喻為「敘說的遇難」(narrative wreckage)(Crossley, 2000)。是故，必須以持續關懷的態度與細膩傾聽的方式，才得以考掘受創者的心創聲音，這是本研究進行的中心理念。

另外，Derrida(1988/1999)指出，喚起記憶即喚起責任。他認為人們不知道死亡告訴我們些什麼，但這正是哀悼的體驗引起我們思考的東西。哀悼的體驗始於



「最早的」蹤跡，也就是說「先於」感知，在感覺的前夕，從而不給某種無邪的求真願望以任何機會。他進而指出，他者一死，我們必然與記憶為伴，故必然趨向內在化，因為他者在我們之外已無所存在。本研究發現失親家毀受創者透過內在語言「思」與「說」的位移，以不同方式追念亡逝者，這不僅是一種哀悼體驗意義，更是一種生活倫理的疏通和存活責任的召喚，透過幽杳關係的締結，扛起處理現實世界裡的衝突與困境任務。此外，尚值得提出省思的是，Russel認為書寫創傷即在重新造訪深藏的記憶，透過創傷的記憶的不斷地展演，釋放過去，賦予沈默的過去一個聲音。這種不斷反覆的歷程是種潛意識自發的療傷企圖，雖有重複痛苦的危險，卻出自創傷倖存者吸收和消除經驗創傷的欲求，此一欲求的滿足為復原療傷的第一步（引自黃心雅，2002）。對Caruth(1995)來說，因為創傷的無法被同化(assimilation)的本質，故事的「全然真實性」因此成為不可能，因為被創傷化的主體無法在第一時間了然所發生之事，但是過去的片段、斷裂的經驗，在事件之後一段時間，卻重複的、鬼魅般的縈繞著此主體，揮之不去。但是，創傷這般倒敘的、幻覺的重現，因此揭露著受難者的故事，有必要被說出、被聽見，因此才有可能從創傷中恢復。本研究雙重失落受創者所揭露的創傷故事，呼應著黃心雅(2002)所指出的，對災難倖存者而言，創傷的記憶是種禁忌，難以言宣，語言的黑洞只能以無法理解的恐懼來呈現，甚至是一種無力留存的無意識。無意識是意識的失落，如此，災難的記憶化成遺忘，記憶無法容納的，就拋給遺忘。

黃心雅(2002)進而點出，創傷記憶具有凌遲效應(belated impact)，爾後另一次事件即可觸發記憶的開啓，Caruth稱為「參照式回溯」(referential return)；Freud也認為創傷絕非單獨存在，相類似創傷事件會重複啟動記憶，此乃記憶的「後遺性」，從前的創傷經驗、記憶痕跡會依新的經驗而被重塑，同時賦予新的意義，就像本研究個案收視到「九一一」事件後的心理反應和恐懼敘事般。然而，並非所有的創傷經驗都可以透過言說，整合至自身的生命體系。LaMothe(2001)精準地提醒，訴說災難是一種通往創傷黑洞邊緣的溝通形式，創傷的黑洞是無法理解的、喪失自我感的、書寫困難的、難以表述的深淵，照見了受創之後，受創者被拆解的語言、自我、知識與社群間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受創者的內在心理、社會歷程及其交互作用下的療癒經驗現象，仍是一種「未完成」的時態，尚待更完形的整全意義開展，亦即受創經驗的涵攝意蘊對受創者而言，是一種未竟事項(unfinished business)。唯有持續陪伴關懷受創者，並細心聆聽受創者的創痛，甚至蔚為一種「鄰人社會學」興味，方得以在心理療癒領域裡形構照顧/關切他人的助人關係，心理重建策略照顧才得以契入受創者生活，疏通其受創阻絕經驗，同時開發其生活網絡。

(二) 研究者的角色反思

如前所示，接受訪談的受創者，均是第一作者長期關懷的案主，而非工具關係下的資料提供者。是故，雙方在研究過程係，是一種互為主體性的互動模式展現，而非單向度的權力支配運作。像本研究案主，有時見到第一作者前往探視，反倒會主動關心研究者近況，第一作者也據實回應，這般關係展現著如同Rogers(1957)所稱的一致性(congruence)，會理會、回應案主的心思和關切。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會在不傷害受訪者為原則下，因地制宜調整角色分際，有時是「觀察者如同參與者」(observer-as-participant)，有時是「參與者如同觀察者」(participant-as-observer)的雙重角色替換，但整個訪談的最終目標，除了累積災難心理學資料外，更要使案主覺察到第一作者對其的真誠、尊重、同理和積極關懷(Rogers, 1957)，非以客觀中立的研究角色自居，相信本研究建構已達此方向。

另外，研究者在震災「創傷膜」尚未縫合以前，即進入案主的生活世界，故得以和案主形成一種「我們」(we-ness)關係，而非一種外來的他人(alienated other)。其實，研究者的長期關懷陪伴，也形構著一種受創心理療癒的有效因子。Pilisuk & Parks(1986)指出，關照交換(caring exchange)的發生，往往是在最微觀的社會層次上(microscopic of social level)。傾聽的意願、一句溫暖的話語、乃至一雙援助的手，都肯認、具象著我們和他人，都是人類社群的一部份。事實上，朋友或志工式的支持團體所形成的非正式的網絡(informal network)，以及正式的專業服務網絡(formal agency services)，是互補於家庭紐帶的兩種社會支持來源。換言之，Pilisuk & Parks(1986)認為，隨著社會的變遷，單向度社會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也



逐漸締結於家庭系統裡，家庭的目的形構為複製生產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場域；家庭成員間的情緒滋養扮演著關鍵性的功能，成員間的情緒疏通與支持，成為努力抵抗家庭不至於屈服於經濟勢力而成為非人格化的系統的重要防線。然而，除了家庭的自然鍵結外(natural bond)，不可省略社會變遷的革命性變化所形成的社會鍵結(social bond)，例如，各式各樣的友誼、志工或互助團體，也成為人類社會支持的重要來源。本研究發現，在進行受創者生活層面關照之際，社會鍵結的照顧契入，經常更可以疏通受苦存有者的整體生活世界困境。

此外，歷經重大災變後的「後創傷反應」，究竟是否該敘說或該隱藏心理經驗，一直是個爭論的議題。Wilkins(2003)認為，讓個體正面承認(acknowledge)創傷和後創傷反應(無論是實質上的或者是潛在上的)，對於個體的「立即效果」或「長期效應」，都會產生正向的心身健康影響。當然，承認創傷和後創傷反應的過程中，可能會階段性地使個體的心身症狀惡化，但那終究是個過程，就長期結果來看，促進個體得以敘說、肯認並理解災難遭遇，是寬解創痛的適切策略。由此，研究者的現身在作為一種支持傾聽敘事的脈絡下，就不只是一種讓案主得以發聲的接應空間意涵而已，更是受創者得已逐漸心理療癒的時間催化劑；在長期效應裡，他者現身的照顧關切契入，將促進案主寬解哀悼與創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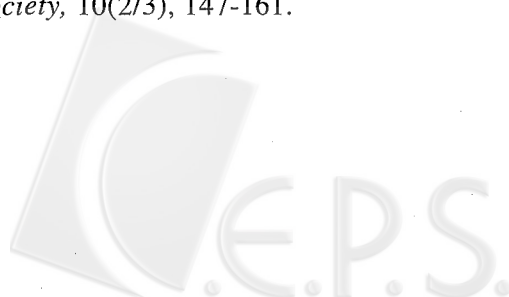
是故，本研究認為未來必須以厚實描述的、長期追蹤的、細膩傾聽的、持續關懷的、整全角度的方式，廣續探究受創者的心理療癒與創痛經驗，方能深入瞭解受創者的生活世界。相信本研究成果，亦足以提供心理重建實務工作者之參考和借鏡。

致 謝

本論文部分資料獲得國科會研究計畫 NSC 90-2625-Z-037-001-及 NSC 91-2625-Z-037-001-經費補助，特此申謝。另外，本論文的受訪個案，雖是匿名的，但卻無損於她們對本文的重大貢獻，筆者藉此表達高度謝意。此外，匿名審查者的建議與意見，使筆者獲益良多；編委會與編輯助理王嘉琳和任怡潔小姐的支持與協助，使本文順利出版，於此也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

- 黃心雅(2002)：《廣島的創傷：災難、記憶與文學的見證》。〈中外文學〉，30卷，9期，頁86-117。
- 張志揚(1999)：《創傷記憶：中國現代哲學的門檻》。上海：三聯書店。
- Bachelard, G. (龔卓軍、王靜慧譯；1969/2003)：空間詩學(*The poetics of space*)。台北：張老師出版社。
- Baker, J. E. (2001). Mourn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object relationships: Evidence for the persistence of internal attachments.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18(1), 55-73.
- Calhoun, L. G. & Tedeschi, R. G. (1998). Posttraumatic Growth: Further direction. In R. G. Tedeschi, C. L. Park, & L. G. Calhoun (eds.), *Posttraumatic growth: Positive changes in the aftermath of crisis*.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Caruth, C. (1995).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aruth, C. (1996).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M. Z., Kahn, D. L., & Steeves, R. H. (2000).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A practical guide for nurse researcher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Inc.
- Crossley, M. L. (2000). *Introducing narrative psycholog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Despres, C. (1991). The meaning of home: Literature review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 8(2), 96-115.
- Flaherty, M. G. & Fine, G. A. (2001).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Conjugating George Herbert Mead's perspective on time. *Time & Society*, 10(2/3), 147-161.



- Frantz, T. T., Farrell, M. M. & Trolly, B. C. (2001). Positive outcomes of losing a loved one. In R. A. Neimeyer (ed.), *Meaning reconstruc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los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 Freud, Sigmund. (1957).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In J. Strachey (ed. And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 14). London: Hogarth Press.
- Giddens, A. (田禾譯；1990/2000)。現代性的后果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南京：譯林出版社。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tman, G. H. (1996). On traumatic knowledge and literary studies. *New Literary History*, 26(3), 537-563.
- Janoff-Bulman, R. (1992). *Shattered assumptions: 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traum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Kleber, R. J., Figley, C. R. & Gersons, B. P. R.(eds.) (1995). *Beyond trauma: Cultural and societal dynamics*. New York: Plenum Press.
- LaMothe, R. (2001). Freud unfortunates: Reflections on haunted beings who know the disaster of severe trauma.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55(4), 543-563.
- McCarthy, J. R. & Edwards, R. (2001). Illuminating meanings of 'the private'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A response to Joe Bailey. *Sociology*, 35(3), 765-777.
- McCubbin, M. A. & McCubbin, H. I. (1993). Families coping with illness: The resiliency model of family stress, adjust, and adaptation. In Danielson, C. B., Hamel-Bissell, B., & Winstead-Fry, P. (eds.) *Families, health, & illness: Perspectives on coping and intervention*. St. Louis: Mosby
- McFarlane, A. C. & Van Der Kolk, B. A. (1996a) Trauma and its challenge to society. In B. A. Van der Kolk, A. C. McFarlane, & L. Weisaeth (eds.) *Traumatic stress: The effects of overwhelming experience of mind, body, and societ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McFarlane, A. C. & Van Der Kolk, B. A. (1996b) Conclus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B. A. Van der Kolk, A. C. McFarlane, & L. Weisaeth (eds.) *Traumatic stress: The effects of overwhelming experience of mind, body, and societ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Myers D. (1994) *Disaster response and recovery: A handbook for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California: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 Pennebaker, J. W. & Harber, K. D. (1993). A social stage model of collective coping: the Loma Prieta earthquake and the Persian Gulf War.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9(4), 125-150.
- Pilisuk, M. & Parks, S. H. (1986). *The healing web: Social networks and human survival*. Hanover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 Pollack, C. E. (2003). Burial at Srebrenica: Linking place and trauma.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6, 793-801.
- Rogers, C. R. (1957).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of therapeutic personality change.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21, 95-103.
- Tedeschi, R.G. & Calhoun, L.G. (1995). *Trauma and transformation : Growing in the aftermath of suffering*. London: Sage Pub.
- Ursano, R. J., McCaughey, B. G., & Fullerton, C. S. (eds.) (1994)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response to trauma and disaster: The structure of human chao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n Berg, J. H. (石世明譯；1966/2001)。病床邊的溫柔 (Psychology of the sickbed)。台北：心靈工坊。
- Williams, M. B., Zinner, E. S., & Ellis, R. R. (1999).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rief and trauma: An overview. In E. S. Zinner & M. B. Williams (eds.). *When a community weeps: Case studies in group survivorship*. Brunner/Mazel: Taylor & Francis Group.
- Wilkins, L. M. (2003). Acknowledg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effect on health: A nursing intervention. *Clinical Nurse Specialist*, 17(1), 34-41.
- Willms, J. L. (1997). Alienation and imagination: The literature of exclusion.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26(11), 923-926.



Double Loss: an Inquiry into the Psychosocial Experiences of the 921 Earthquake Bereaved Victims

YAW-SHENG LIN, YIN-CHANG WU

The calamitous '921' earthquake entailed long-term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of posttraumatic psychological changes.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peri-disaster and post-trauma life impacts and the psychosocial experiences of the bereaved victims who faced both losing a loved one and house collapse. The method used was based upon multiple research paradigms, including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depth interview, and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Ten cases at a disastrous site of central Taiwan were interviewed at least once from August 2001 to December 2002. As the discursive data showed, it was found what the bereaved family coped against the double loss and established a form of continuing relationship that satisfied the emotional need of maintaining their ties with the deceased, including "rumination", "refusal of plain explanation", "attachment", and "sublimation".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 social processes of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s included "the formation of weak tie", "the flexibility of family reconstruction",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inking' and 'telling' about the double loss encounters". The role-taking strategy adopted to cope with the life disruption included "the new life signpost", "becoming the wounded healer", and "the change of life beliefs". In further analysis, we found the critical turning point from the victimization to survivorhood was the supportive social bond and the house reconstructed at the original place. Those who build their houses at non-original places were the less adaptive ones. How the victims perceived and interpreted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renovated house was a critical life task during the posttraumatic periods. Inferred from the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trauma is a repetitious suffering from the particular event, but it is also a continual "leaving of its site". It is a challeng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uma and pathology. Finally, a conceptual model was proposed, and the implications from the study were discussed further.

Key word: trauma, intra-psyche, social processes, role-taking

Yaw-Sheng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linical and Counseling Psycholog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Yin-Chang W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